

新冠病毒感染疫情冲击下的全球化趋势分析与评估

孙 莎,牛华勇,杨 丹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北京 100089)

摘 要:从经济、社会和政治维度构建并测算 2000—2020 年全球 142 个国家或地区的全球化参与度和参与基础指数,并采用全球化晴雨表模型,进行全球化趋势分析与评估。研究结论表明:(1)新冠病毒感染疫情冲击下 2020 年全球参与度和参与基础均低于趋势。其中,经济和政治维度是拖累全球化参与度的主要因素,而社会参与度却逆势上扬;经济、社会和政治维度均对全球化参与基础水平作出了负贡献。(2)各区域乃至各国别的全球化参与度与参与基础存在差异。(3)中国的全球化参与度和参与基础均高于中位数,属于全球化成熟型国家,但参与度排名高于参与基础,发展并不平衡。研究结果为我国制定与完善对外开放等相关政策提供了重要参考依据。

关键词:全球化;疫情冲击;全球化趋势分析

中图分类号:C9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0566(2023)01-0013-10

Globalization trend analysis and assessment under the impact of Covid-19 contagion

SUN Sha, NIU Huayong, YANG Da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chool,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9,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constructed and measured the globalization participation degree and participation basis index of 142 countries or regions in the world from 2000 to 2020 from economic, social, and political dimensions and used the globalization barometer model to analyze the globalization trend. The findings show that: (1) Under the pandemic shock, the globalization participation degree and participation basis in 2020 were below the trend. Among them, the economic and political dimensions were the main factors dragging down the globalization participation level, while the social participation level was bucking the trend; the economic, social, and political dimensions all contributed negatively to the globalization participation basis level. (2) There are differences in participation degree and participation basis of globalization among different regions/countries. (3) China's globalization participation and participation base are both above the median. But its participation ranking is higher than the participation basis, which implies its development is unbalanced. The research in this paper can provide a solid theoretical foundation for China to formulate and improve its policies related to opening up and reform.

Key words: globalization; epidemic impact; globalization trend analysis

收稿日期:2022-07-29 修回日期:2023-01-04

基金项目:北京外国语大学双一流重大(点)标志性项目(2022SYLZD001);北京外国语大学双一流建设“新冠疫情”研究专项项目(SYL2020ZX015);北京外国语大学一流学科建设科研项目(YY19ZZB012);北京外国语大学新入职青年教师科研启动项目(2018QD013)。

作者简介:孙莎(1989—),女,安徽巢湖人,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商学院讲师,经济学博士,研究方向为全球化与宏观经济。通信作者:牛华勇。

作为当今世界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发展趋势,全球化对各国或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科技等近乎一切领域均产生了持久而深远的影响。近年来,全球化整体趋势在不断增强。这既得益于全球公民意识的普遍提升^[1],又受益于全球化在经济、社会等维度带来的人类福利增加^[2]。然而,全球化进程并非一帆风顺,受到了逆全球化思潮、经济孤立倾向和文化保守倾向等因素的冲击,其发展历程表现出曲折性。2020 年新冠病毒感染疫情的暴发给深度发展的全球化踩下了急刹车,甚至有学者将其界定为“熔断”现象^[3]。如何客观合理地评估全球化发展趋势?未来全球化何去何从?在当前具有高度不确定性的时代,对于这些问题的探究和解答兼具丰富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基于此,本文首次提出“全球化晴雨指数”概念,对全球化发展趋势的测算与评估进行了创新性尝试。“全球化晴雨指数”是在测度各国或地区全球化参与水平基础上,借助晴雨表模型,基于全球化进程历史背景,紧密结合全球化最新发展动态,提出的用于趋势分析的综合性指数。具体而言,本文从经济、社会、政治三大领域开展指数构建,测算了全球 142 个国家或地区 2000—2020 年的全球化参与度和参与基础指数,并采用全球化晴雨表模型,进行趋势分析和评估。本文的潜在贡献包括以下几点:一是在研究视角方面,在目前笔者所掌握的国内外文献中,本文是首次量化分析与评估全球化趋势的研究;二是在指标体系方面,本文以构建更具包容性的指标体系为核心,关注并摒弃了 KOF 全球化指数等现有文献中混淆全球化与西方化等做法,剔除了部分指标,并增设了边际更优的指标;三是在模型设置上,本文首次创新性地世界贸易组织(WTO)开发的贸易晴雨表(Global Trade Barometer)模型引入全球化研究领域,为全球化趋势分析与评估提供了合理可行的量化工具。

一、文献综述

(一)全球化趋势分析的相关研究

对于全球化趋势走向分析,现有文献未能达成一致观点。有研究指出全球化趋势不可逆转,

全球化依然会继续向前发展。Altman 等^[4]的研究通过数据表明各类全球化变量呈现出来的韧性比大多数人预期的更好。还有研究则通过理论分析认为全球化内在动因并未改变。Contractor^[5]认为民族主义和保护主义抬头所引起的逆全球化趋势是边缘性的。Appadurai^[6]提出全球化并不会因疫情而终结,尽管其发展会受到排外心理和排挤边缘群体做法等潜在冲击。裴长洪等^[7]认为当前因保护主义和单边主义兴起而导致的逆全球化是短暂的,全球化前进的动力依然存在。

然而,也有学者对全球化前景持悲观态度,甚至认为在新冠病毒感染疫情冲击下,全球化面临停滞甚至倒退风险。万广华等^[2]认为利益分配问题和第四次技术革命将最终导致本轮全球化走向终结。阎学通^[8]指出政府和跨国公司在疫情后将采取更多的去全球化策略。还有学者从政治维度进行探讨。Delios 等^[9]认为国家政府对竞争的干预增加导致全球一体进程动能消减。Ripsman^[10]认为随着美国霸权的衰退和多极化的兴起,世界将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Broz 等^[11]提出经济和社会全球化遭受来自民粹主义的抵制浪潮。Walter^[12]认为经济、政治、社会文化三个层面的全球化均面临抵制威胁。此外,还有学者从经济全球化维度研究,黄建忠^[13]认为未来全球化将呈现出一种碎片化、区域化、结构化的趋势。

另外,还有学者持中性态度,认为全球化趋势不能一概而论,而是存在纵向时间维度或横向结构维度上的异质性。从纵向时间维度来看,姚枝仲^[14]认为短期内全球化进程仍将倒退;从长期来看,全球化终将再次成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潮流。从横向结构维度来看,El-Erian^[15]提出政治精英的应对策略将决定未来将陷入各自为政还是进化出更有效的全球化系统。郑宇^[16]认为 2008 年危机后发达国家从自由贸易的推动者变成了保护主义的实施者,而发展中国家则从全球化的被动参与者变成了主动捍卫者。唐宜红等^[17]指出后疫情时代的全球化从以效率主导转向兼顾效率、公平与安全。王栋等^[18]提出全球化新趋势具有多中心化特点。

(二) 全球化指数(量化测度)的相关研究

最早较为系统地测算全球化水平是由美国 A. T. Kearney 管理咨询公司和 Foreign Policy 杂志共同发布的 A. T. Kearney/Foreign Policy 全球化指数^[19]。该指数从经济融合、个体交流、技术合作和政治参与 4 个维度出发,对全世界 62 个发达和部分发展中国家进行了全球化水平测算与排名。一般认为,在学术界具有广泛影响力的是瑞士联邦苏黎世理工学院经济研究所发布的 KOF 全球化指数^[20]。该指数从经济、社会、政治 3 个维度,采用 43 个指标,覆盖了全世界 203 个国家或地区在 1970—2018 年期间的数据。此外,英国华威大学发布的 CSGR 全球化指数^[21],从经济、社会和政治 3 个维度,采用 16 个指标,覆盖了 119 个国家或地区 1982—2004 年期间的数据。其特色是剔除了国家本身特质带来的潜在干扰。Figge 等^[22]构建了 Maastricht 全球化指数,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科技和环境 5 个维度测算了 117 个国家于 2002 年、2008 年和 2012 年的全球化水平。由美国 DHL 公司和纽约大学斯特恩商学院共同发布的 DHL 全球连通性指数^[4],从国际资本、贸易、信息和人员流动 4 个维度,采用 12 个指标,测算了 140 个国家或地区在 2005—2020 年期间的全球化深度和广度。

综上所述,相关研究取得了一定的进展,然而仍存在以下局限性:一是对疫情后全球化前景判断尚未达成一致意见,研究基础大多停留在理论层面;二是构建的指数在指标体系选取等方面仍存在进一步完善的空间,如 KOF 全球化指数在指标选取上将全球化与西方化混淆,DHL 全球连通性指数侧重于经济维度,难以刻画全球化全貌等。鉴于此,本文构建并测算全球化参与度和参与基础指数,并采用全球化晴雨表,进行趋势分析和评估。

二、指标选取与权重设定

(一) 指标选取基础

在理论层面,参照 Sklair^[23]和 Gygli 等^[24]的研究结果,本文将全球化定义为:各个国家在经济、社会和政治维度上的相互联系、依赖和交融的过程。其中,经济全球化主要体现在商品生产和消

费的跨国流动和要素在全球范围内的优化配置。社会全球化包括人和信息的跨国流动和传输,与之伴随的科学技术和文化的跨国交流。政治全球化主要体现一国政府与别国政府及在国际组织框架下的交流合作。在实践层面,虽然近年来各国参与全球化的实际程度不断上升,但是部分国家在政策制定与态度上对全球化向好发展构成潜在威胁,体现出全球化参与基础的下降。因此,在本指数构建中引入了参与度和参与基础两大维度,将“参与度”定义为一国参与全球化的事实实现程度,“参与基础”定义为该国为其参与全球化提供更多可能性而施行的决策、政策、制度及其他积极因素。

(二) 指标选取原则

本文的指标选取原则既包括一般性原则,也包括与全球化研究领域相关的特有的指标选取原则。一般性原则包括:一是全面性与代表性相结合,即某一维度下的指标设置需能保证所有子指标能覆盖全面,且各个子指标各具代表性^[22]。如经济全球化包含贸易和金融的全球化,缺一不可,此为全面;金融全球化指标中,“资本账户开放度”与“投资限制”这两个指标所测量的维度高度重叠,本文只选其一,此为代表。二是保证数据可得性和覆盖率。在众多数据可得指标中,尽可能选取数据覆盖率高的指标,以提高指数测算结果的准确性。

与全球化研究领域相关的特有指标选取原则包括:一是侧重包容性,即摒弃明显带有地域、种族或文化倾向性的指标。在现有全球化指数研究中,KOF 指数在文化全球化维度采用了一国的麦当劳餐厅数量、一国的宜家商场数量以及美国智库 Freedom House 发布的媒体自由指数等。麦当劳餐厅和宜家商场的数量衡量的是各国或地区受西方国家的影响,即西方化的程度。而美国智库 Freedom House 的人员构成、价值理念、运作资金以及指数的数据来源均有浓厚的西方背景,该项指标不能客观反映各个国家的客观情况^[25]。二是体现双向性,即一国或地区参与全球化应包含流入和流出的双向性。如对于“商品贸易”与“国际旅游”等指标,将流入量和流出量同时纳入。类似

地,对于“国外直接投资”与“有价证券投资”等指标,将会计科目借方和贷方同时纳入。

(三) 指标选取

本文从经济、社会和政治 3 个维度,构建了包

含 3 个一级指标、8 个二级指标以及 28 个三级指标的全球化参与度与参与基础指标体系,如表 1 所示。为使得指标具有可比性,参照李晓西等^[26]和 Gygli 等^[24]的研究,本文指标多采用相对指标。

表 1 全球化晴雨指数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数据来源	计算方式
经济全球化	贸易全球化	参与度	商品贸易	World Bank WDI	商品贸易/GDP
			服务贸易	World Bank WDI	服务贸易/GDP
		参与基础	关税	World Bank WDI	- 关税率未加权平均数
			贸易协定	DESTA	贸易协定数
	金融全球化	参与度	境外直接投资	IMF IIP	境外直接投资/GDP
			有价证券投资	IMF IIP	有价证券投资/GDP
			国际收入支付	IMF BoP Standard Presentation	国际收入支付/GDP
		参与基础	资本账户开放度	Knoema	Chinn-Ito 指数 ^[27]
社会全球化	信息全球化	参与度	互联网带宽	ICT-Eye	国际互联网带宽总使用量
		参与基础	互联网普及率	ICT-Eye	互联网普及率
	人际全球化	参与度	国际旅游	World Bank WDI	出入境旅游人口/总人口
			留学生	World Bank WDI	留学生/总人口
			移民	World Bank WDI	移民/总人口
		参与基础	签证发放	DEMIG VISA	免签国家个数
			国际机场	CIA World Factbook	国际机场数/机场总数
	科技全球化	参与度	国际专利	World Bank WDI	非本国公民申请的专利/总体
			高科技出口	World Bank WDI	高科技出口/总体
		参与基础	全球创新指数	GII	全球创新指数
	文化全球化	参与度	印刷品贸易	UN Comtrade Database	印刷品出口贸易
			国际商标	WIPO IP Portal	非居民外国人注册商标量/总注册量
		参与基础	社会包容度	World Value Survey	社会包容度指数
			语言流行度	Ethnologue	非本国人使用该国主要官方语言人数/该语言使用总人数
政治全球化	国际合作	参与度	外事机构	Lowy Global Diplomacy Index	使馆数、总领馆数、常驻代表团数和其他代表处数
		参与基础	国际组织	CIA World Factbook	参与的政府间国际组织数
			国际条约	United Nations Treaty Collection	签署并受正式批准的国际条约数
	全球治理	参与度	联合国建言贡献度	UN Digital Library	一国在联合国会议上公共演讲次数
		参与基础	维和意愿	United Nations Peacekeeping	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人数

(四) 赋权方法

本文拟采用客观赋权法中的 CRITIC 法进行权重设定。该方法是基于评价指标的对比强度和指标之间的冲突性来综合衡量指标的客观权重。该赋权法的优势在于客观公正,成本低,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应用广泛。

假设经标准化处理后的多指标数据矩阵 M 如下:

$$M = \begin{bmatrix} x_{11} & x_{12} & \cdots & x_{1n} \\ x_{21} & x_{22} & \cdots & x_{2n} \\ \vdots & \vdots & \ddots & \vdots \\ x_{m1} & x_{m2} & \cdots & x_{mn} \end{bmatrix} \quad (1)$$

其中, x_{ij} 是第 i 个样本在第 j 个指标的取值。

首先,计算指标内的变异性 S_j 。使用标准差来表示各指标取值的波动情况,标准差越大表示该指标的数值差异越大,包含的信息越多,应增加对该指标分配的权重。计算方法如下:

$$\begin{cases} \bar{x}_j = \frac{1}{m} \sum_{i=1}^m x_{ij}, \\ S_j = \sqrt{\frac{1}{m-1} \sum_{i=1}^m (x_{ij} - \bar{x}_j)^2} \end{cases} \quad (2)$$

其次,计算指标间的冲突性 R_j 。使用相关系数来体现指标间的冲突性,一个指标与其他指标的相关性越强,则与其他指标的冲突性越小,反映出重复的信息越多,也就削弱了该指标的评价强度,应减少对该指标分配的权重。计算方法如下:

$$R_j = \sum_{k=1}^n (1 - r_{kj}) \quad (3)$$

式中, r_{kj} 是第 k 个指标和第 j 个指标的相关系数。

综上所述,第 j 个指标的信息量是指标的变异性与冲突性的乘积:

$$C_j = S_j \cdot R_j \quad (4)$$

最后,第 j 个指标的客观权重 W_j 为:

$$W_j = \frac{C_j}{\sum_{j=1}^n C_j} \quad (5)$$

(五) 数据来源、样本选取与数据处理

本文构建的指标体系涉及经济、社会和政治多个维度,数据来源亦趋于多元化,包括联合国(United Nations)等权威国际组织发布的联合国国际贸易数据库(UN Comtrade Database)、世界发展数据库(World Development Index)等共计 19 个数据库,如表 1 所示。指标体系中有 6 个指标,包括国际机场、语言流行度、国际组织、国际条约、联合国建言贡献度和维和意愿,是由手工收集数据并一一整理而来的。样本选取上,本文首先收集了 1970—2020 年 195 个国家或地区的数据,在尽可能提高数据覆盖率并且保证样本结构一致的原则下,以 2000 年为基年,选取 142 个国家或地区的样本。数据处理方法,我们采用线性插值、补值进行

缺失值处理,并采用 Zscore 法进行标准化,以剔除量纲和单位影响。

三、基于全球化晴雨指数的全球化趋势分析

(一) 全球化参与度与参与基础的测算结果

基于前述测算,本文计算了全球化及其在经济、社会和政治 3 个维度的参与度与参与基础指数的世界平均值,以直观体现全球化发展的时间序列趋势,如图 1 所示。从总体趋势来看,自 2000 年以来,全球化参与度与参与基础呈增长趋势,其间存在小幅波动。分阶段来看,2008 年金融危机是分水岭:无论从全球化总体,还是经济、社会、政治 3 个维度,全球化参与度均自危机后明显下降,并促使全球化参与基础增速随后下滑。2008 年金融危机对于全世界的全球化进程形成了重大且深远的滞后负面冲击。2008 年金融危机后,全球化参与度保持平稳,略有增长,而参与基础于 2015 年再次形成增速拐点。参与度的艰难恢复主要是经济维度的贡献。后危机时期,主要经济体的经济复苏进程缓慢,直接导致了经济全球化进程的扭转乏力^[28]。在参与基础方面,危机后增速放缓且在 2015 年再次放缓,主要在经济和政治维度有所体现。在经济维度,主权信用风险的外溢使得各国参与全球化基础产生了冲击^[29]。在政治维度,民粹主义等逆全球化思潮蔓延^[3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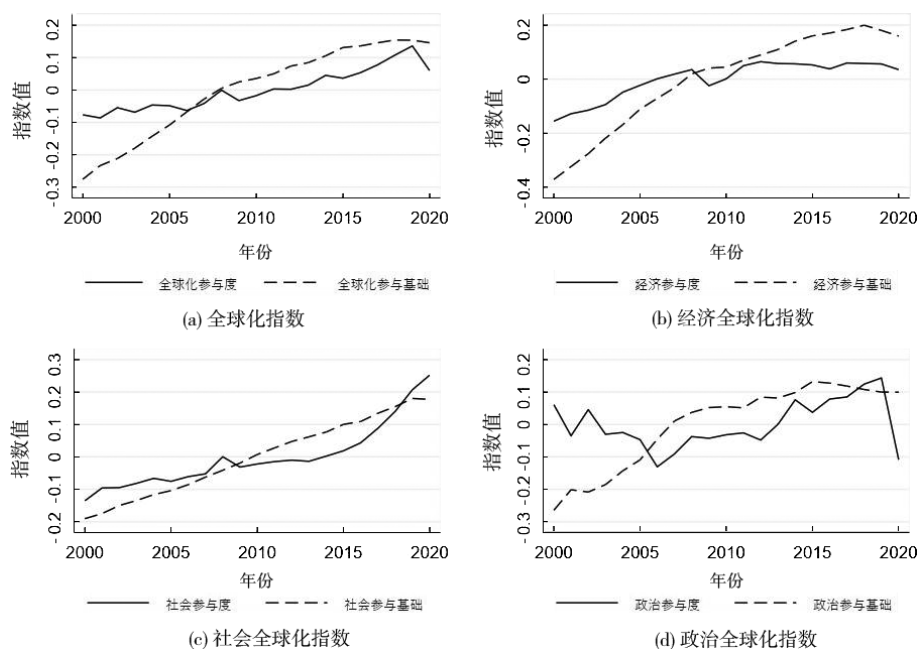


图 1 全球化参与度与参与基础

(二)与现有其他全球化指数的对比

为验证本文所构建全球化指数^①的有效性,将其与其他代表性指数进行对比,如图 2 和表 2 所示。从图 2、表 2 可知:①Pearson 相关性检验表明,全球化参与度与其他代表性全球化指数的相关程度较高,都在 70% 以上,这表明本项目测度的全球化水平与现有研究保持一致。②与 KOF 指数、CSGR 指数相比,全球化参与度指数测算了更新的时间区间。与 DHL 指数相比,在部分时间区间上趋势有差异,这可能是由于两个指数测度的维度不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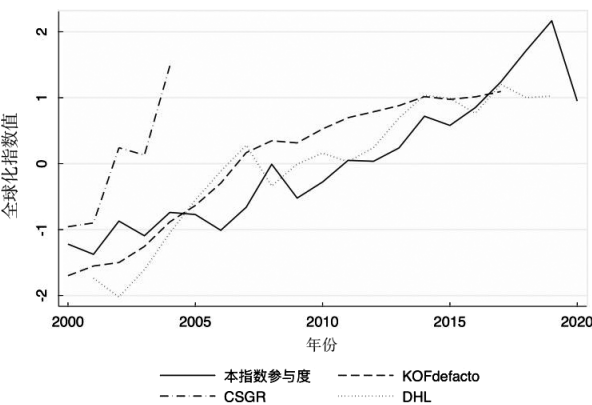


图 2 全球化参与度与现有其他全球化指数的对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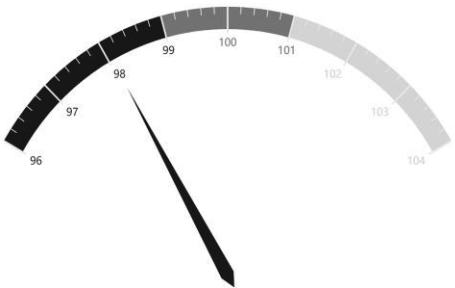
表 2 全球化参与度与其他代表性全球化指数的 Pearson 相关系数

变量	(1)	(2)	(3)	(4)
本指数参与度	1.000	—	—	—
KOF <i>de facto</i>	0.890	1.000	—	—
CSGR	0.927	0.927	1.000	—
DHL	0.819	0.960	0.704	1.00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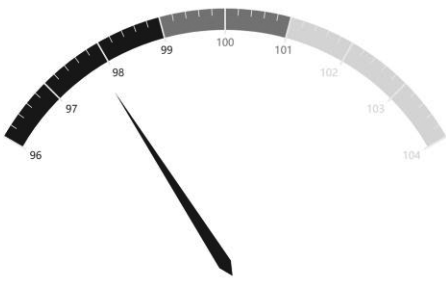
(三)全球化晴雨指数编制思路与趋势分析

参照世界贸易组织^[31] (WTO) 提出的贸易晴雨指数 (Global Trade Barometer), 本文构建了全球化晴雨指数。编制方法为: 首先, 对全球化参与度和参与基础指数进行 HP 滤波处理, 提取趋势项; 其次, 将平滑后指数值与趋势项相减, 得到偏离项; 最后, 将偏离项标准化, 并加上 100, 将此与晴雨标准区间对比, 便可得到对应的晴雨表区间。晴雨标准区间的设定方式为: 以 100 为趋势基准, 将 (99, 101)、(101, +∞)、(-∞, 99) 3 个区间分别对应“大体符合趋势”(深灰色)、“高于趋势”(浅灰色)和“低于趋势”(黑色)。图 3 展示了 2020 年全球化参与度和参与基础晴雨表。2020 年, 全球化参与度晴雨指数为 98.06, 处于“低于趋势”区间。全球化参与基础晴雨指数为 97.82, 处于“低于趋势”区间。在新冠病毒感染疫情冲击下, 全球化发展遭遇挫折, 世界平均意义的全球化参与度和参与基础双双下滑, 均低于趋势, 这与预期是一致的。

进一步分解, 2020 年, 经济参与度晴雨指数为 98.36, 为低于趋势, 对全球化参与度作出了负贡献; 社会参与度晴雨指数为 102.51, 高于趋势, 对全球化作出了正贡献; 政治参与度晴雨指数为 97.58, 低于趋势, 作出了负贡献。这意味着拖累 2020 年全球化参与度的因素主要集中在经济和政治维度。在经济全球化参与度方面, 2020 年经济全球化参与度加速退潮, 尤其是在贸易领域出现了大幅下滑, 这主要是因为新冠病毒感染疫情重



(a) 全球化参与度晴雨表



(b) 全球化参与基础晴雨表

图 3 全球化晴雨表

① 除 KOF 指数外, 鲜有全球化指数刻画参与基础, 因此本文仅将全球化参与度与现有全球化指数进行对比。

创全球产业链。疫情之初,中国停工停产,使得产业链上游零部件制造等环节停摆,供给疲软。随着疫情蔓延,发达国家停工停产造成需求短缺,等到中国企业复工后又面临缺乏订单的难题。如此一来,全球价值链回流加速,商品贸易和服务贸易双双走低。政治全球化参与度方面,疫情冲击下各国通过联合国参与全球治理的参与度有所下降。虽然联合国关键工作并未因疫情而中断,但受疫情影响,国际旅行受限,联合国会议大量选择采取线上形式,削减面对面会议频次,并大幅缩短会议时长,各国实际政治全球化参与程度有所下降。

与经济和政治维度形成强烈对比的是,疫情冲击下社会全球化参与度逆势增长,成为经济、社会和政治维度中唯一高于趋势的维度。这主要是由于信息全球化维度的正向贡献。虽然国际层面的人员往来减少在一定程度上对社会全球化发展构成了负面效应,但是信息全球化参与度大大提升,仍然拉高了社会全球化参与度整体水平。疫情迅速蔓延导致世界众多国家纷纷采取严格的疫情防控和封锁措施,各项线下活动与交流受到严重阻碍,线上服务需求却因此迅猛增长。数字化技术提升了企业和家庭信息沟通的灵活度,保证社会全球化在突发冲击下能够表现出较高水平的韧性。本文结论与 Altman 等^[4]的研究具有相似趋势:人际全球化遭受了来自新冠病毒感染疫情的强烈冲击,而信息全球化却保持了正增长趋势。

2020年,经济、社会和政治参与基础晴雨指数分别是 98.78、97.59 和 98.27,均低于趋势,作出了负贡献。事实上,疫情冲击下全球化参与基础下滑是近年来全球化参与基础回落趋势的延续。在经济维度方面,随着贸易保护主义在发达国家抬头,各国关税壁垒高筑,贸易摩擦趋向常态化。新冠病毒感染疫情冲击则进一步加剧了这种压力。然而,发达国家的福利制度已然高度固化,难以通过改革满足不断增加的社会保护需求,而只能诉诸保护主义手段来缓解国际市场的冲击^[17]。在社会维度方面,新冠病毒感染疫情暴发以来,各国纷纷收紧入境条件、加强边境管控,众多具有跨国性质的活动被迫取消或转为线上举行,进一步

限制了跨国社会交流活动。在政治维度方面,近年来政治全球化进程受到了主权国家或地区层面政治因素的制约,出现了全球化与单一国家或单一地区利益对峙的情况,使得政治层面一体化进程面临巨大风险与挑战。

四、进一步分析

(一)根据参与度和参与基础组合划分的四类全球化参与者

由于排名结果对于指标选取和权重设定方法非常敏感,区间划分比具体排名的结果更为稳健^[22]。根据这一思路,本文将全球化参与度和参与基础相结合,以中位数为分界线,把所有样本国家/地区划分为 4 个象限,分别对应 4 种类型全球化参与者,如图 4 所示。第一类是成熟型。处于第一象限的国家/地区具有很高的全球化参与程度,同时具有深厚的参与基础,是驱动全球化的重要力量,因此可以称为全球化成熟型国家/地区。主要发达经济体和中国都属于成熟型国家。举例来说,在全球化参与度排名中,中国香港、卢森堡和马耳他位列前三,而在全局化参与基础维度方面,法国、德国和荷兰位列前三。第二类是潜力型。处于第二象限的国家/地区具有相对较高的参与基础,然而在全球化中的实际参与度较低,全球化的发展具有潜力,因此被称作全球化潜力型国家/地区。潜力型国家/地区主要包括中东欧、拉美和加勒比地区和中东北非地区,代表性国家包括捷克、阿根廷、埃及等。第三类是闭塞型。处于第三象限的国家/地区,其全球化参与程度与参与基础都低于中位数水平,在全球化大背景中表现出一定的闭塞性,因此被称为全球化闭塞型国家/地区。全球化闭塞型国家/地区主要涵盖中亚地区和撒哈拉以南地区,还包括亚太地区、拉美和加勒比地区的欠发达国家或地区。这一类型的代表国家是哈萨克斯坦、尼日利亚、斐济等。第四类是活跃型。处于第四象限的国家/地区,具有高于中位水平的参与度,然而参与基础较低,表现出一种相对活跃的状态,因此被称为活跃性国家/地区。活跃性国家/地区较少,主要分布在亚洲和拉丁美洲,有越南、阿塞拜疆、黎巴嫩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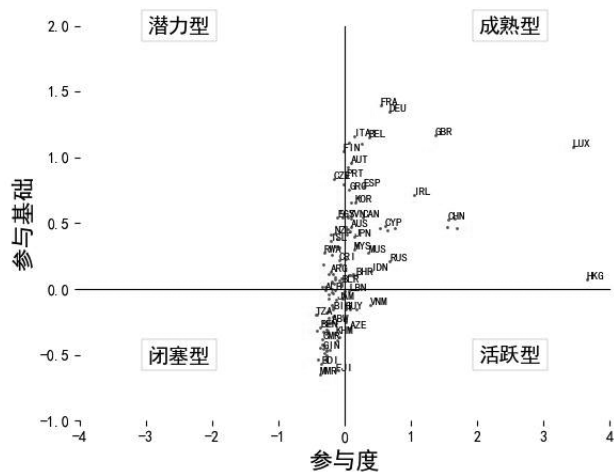


图4 各国参与度与参与基础分布散点图

(二) 中国的全球化参与度与参与基础

中国的全球化参与度和参与基础均高于中位数水平,因此属于全球化成熟型国家。在 142 个样本国家或地区中,中国的全球化参与度排名第 5,而参与基础位列 30 名。由于参与度排名高于参与基础,中国的全球化参与整体水平并不平衡。

从全球化参与度来看,中国的社会和政治全球化均位于领先地位,而经济全球化参与度排名较为靠后。这主要是由于相对指标计算方式带来的“大国偏差”。贸易全球化和金融全球化维度的指标多由贸易总量、资本流动总量等经 GDP 总量调整后计算而来。这种相对计算方式虽然能够使得指标具有横向可比性,但也带来了大国和小国因经济规模带来的偏差。小国往往排名靠前,如卢森堡、马耳他、爱尔兰,而大国往往靠后,如中国、美国等。

在全球化参与基础方面,中国的政治全球化参与基础较为靠前,而经济、社会全球化参与基础略显薄弱。在经济全球化参与基础方面,中国的贸易全球化参与基础为主要拖累因素。这可能源于新冠病毒感染疫情和中美贸易摩擦的双重影响。在社会全球化参与基础方面,信息和文化全球化参与基础为主要拖累因素。信息维度,中国互联网普及率与美英等主要发达经济体之间还存在较大差距,尤其在偏僻地区存在短板。从文化全球化参与基础维度来看,在文化包容度指标方面,中国排名较为靠后,这一方面从传统意义上来

看中国并非是移民国家,拥有相对明确的主体民族和主体文化,因而社会观念和价值取向同一性更强;另一方面,中国的人均生活水平尚未达到世界领先地位,民众对于更高层次、多样化的文化生活需求相对较低,相关基础设施亦较少。在语言流行度方面,作为中国官方语言和通用语言的汉语传播力度相对较弱。其原因:一是汉语在历史上未曾在较大地理区域范围内获得广泛使用;二是汉语和世界广泛通行的语言差异较大,不易习得。

五、结论与政策启示

(一) 研究结论

本文从经济、社会、政治三大领域,构建并测算了全球 142 个国家或地区 2000—2020 年的全球化参与度和参与基础指数。基于此,本文采用全球化晴雨表模型,进行了趋势测算与分析。研究表明:疫情冲击下全球化参与度和参与基础均低于趋势。其中,经济和政治全球化参与度是拖累全球化参与度的主要因素,而社会参与度却逆势上扬;经济、社会和政治全球化参与基础均对全球化参与基础水平作出了负贡献。进一步地,各区域乃至各国别的全球化参与水平体现出明显差异。其中,中国的全球化参与度和参与基础均高于中位数,属于全球化成熟型国家,但中国的全球化参与度排名高于参与基础,两者发展并不平衡。

(二) 政策启示

虽然全球化趋势受新冠病毒感染疫情冲击下短期有所波折,但是仍存在积极向好的结构性因素,从长期趋势看全球化仍然会正向发展^[32]。本文的结论对于中国有效应对疫情冲击、推进全球化发展行稳致远具有重要的政策启示。

首先,经济全球化参与度和参与基础均受到了疫情的显著负向冲击。就中国而言,全球化参与度和参与基础排名均较为靠后,存在进一步提升的空间。在贸易方面,中国应在积极融入贸易一体化的进程中,创新思维拓展自贸区等贸易合作机制,实现与更多国家和地区的关税互减互免,不断推动商品流动便捷化、关税障碍最小化;在金

融方面,中国可进一步发展人民币海外结算业务。此外,中国应紧抓数字经济发展新契机,主动融入数字经济全球化进程,提升在数字经济领域的全球化参与实力。

其次,从社会全球化维度来看,中国应当进一步把握契机,加快建设以5G网络等为抓手的智能化综合性数字信息基础设施。同时,加强科研投入,大力支持高校、研究院所以及高科技企业的产学研合作,推动数字技术攻关研究。横向对比来看,中国文化和信息全球化参与基础与其他主要经济体尚存一定的差距,需要有针对性地逐步补齐发展短板。在文化全球化参与基础方面,可积极运用线上平台开展文化交流活动,高度重视国际汉语教育在“走出去”战略中的战略位置,还可充分利用国际化资源存量,利用信息技术探索国际学术交流新形式^[33]。在信息全球化基础设施方面,可加强在乡村和偏远地区等的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还可在信息基础设施尖端技术方面进一步发力,提升在空间通信等领域的实力。

最后,从政治全球化维度来看,未来中国在理念上应继续秉持开放包容心态,发扬中国智慧,推动政治全球化良性发展。在行动上,应维护和践行多边主义,积极参与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多边活动,广泛参加多边条约和国际公约,不懈推进国际事务中和平与发展问题的长效解决。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努力在国际条约与公约、合作框架等制定中发挥更大作用,提升全球性制度体系规划与制订中的话语权。

参考文献:

- [1] BUCKNER E, RUSSELL S G. Portraying the global: cross-national trends in textbooks' portrayal of globalization and global citizenship [J].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2013, 57(4): 738-750.
- [2] 万广华, 朱美华. “逆全球化”: 特征、起因与前瞻[J]. *学术月刊*, 2020, 52(7): 33-47.
- [3] 刘贞贞. 全球化“熔断”及其历史大转折[J]. *国际政治研究*, 2020(3): 138-142.
- [4] ALTMAN S A, BASTIAN P. DHL global connectedness index 2020 - the state of globalization in a distancing world [R]. New York, NY: NYU Stern School of Business, 2020.
- [5] CONTRACTOR F J. The world economy will need even more globalization in the post-pandemic 2021 decade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021(2): 1-16.
- [6] APPADURAI A. Coronavirus won't kill globalization, but it will look different after the pandemic [EB/OL]. (2020/03/19) [2022/5/10]. <https://time.com/5838751/globalization-coronavirus>.
- [7] 裴长洪, 倪江飞. 坚持与改革全球多边贸易体制的历史使命——写在中国加入WTO 20年之际[J]. *改革*, 2020, 321(11): 5-22.
- [8] 阎学通. 新冠肺炎疫情为去全球化提供合理性[J]. *国际政治科学*, 2020, 5(3): 4.
- [9] DELIOS A, PERCHTHOLD G, CAPRI A. Cohesion, COVID-19 and contemporary challenges to globalization [J]. *Journal of world business*, 2021, 56(3): 101-197.
- [10] RIPSAN N M. Globalization, deglobalization and great power politics [J].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21, 97(5): 1317-1333.
- [11] BROZ J L, FRIEDEN J, WEYMOUTH S. Populism in place: the economic geography of the globalization backlash [J].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2021, 75(2): 464-494.
- [12] WALTER S. The backlash against globalization [J].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2021, 24(1): 421-442.
- [13] 黄建忠. 全球化“熔断”与中国的非稳态战略机遇期[J]. *探索与争鸣*, 2020(8): 26-28.
- [14] 姚枝仲. 新冠疫情与经济全球化[J]. *当代世界*, 2020(7): 11-16.
- [15] EL-ERIAN M A. The future of economic and financial globalization [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2017: 33-39.
- [16] 郑宇. 开放还是保护——国家如何应对经济危机[J]. *世界经济与政治*, 2018(12): 23.
- [17] 唐宜红, 张鹏杨. 后疫情时代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发展趋势及中国应对策略[J]. *国际贸易*, 2020(11): 4-10.
- [18] 王栋, 贾子方. 新冠肺炎疫情与技术进步双重影响下的全球化趋势[J]. *国际论坛*, 2021, 23(1): 18-31.
- [19] A T KEARNEY, FOREIGN POLICY. Measuring globalization [J]. *Foreign policy*, 2001(122): 56-65.
- [20] DREHER A, GASTON N, MARTENS P, et al. Measuring globalisation-opening the black box: a critical analysis of globalisation indices [J]. *Journal of globalization studies*, 2009(1): 25-37.

(下转 83 页)

- 全要素生产率[J]. 经济研究, 2015(5):61-75.
- [7]许志勇,刘宗慧,彭芸. 中小企业资产、价值、大数据与平台融资[J]. 中国软科学, 2021(12):154-162.
- [8]周晓艳,汪德华. 西方产业组织理论买方垄断势力衡量方法的述评[J]. 产业经济研究, 2006(2):68-74.
- [9]曲创,朱兴珍. 垄断势力的行政获取与高额利润的市场获得——对银联身份变迁的双边市场解读[J]. 产业经济研究, 2015(1):101-110.
- [10]梁平汉,江鸿泽. 金融可得性与互联网金融风险防范——基于网络传销案件的实证分析[J]. 中国工业经济, 2020(4):116-134.
- [11]张扬. 互联网金融的平台垄断与反垄断监管[J]. 人民法治, 2021(7):40-43.
- [12]BELLEFLAMME P, PEITZ M. Price disclosure by two-sided platforms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2019, 67(12):1-19.
- [13]MELAMED A D, PETIT N. The Misguided assault on the consumer welfare standard in the age of platform markets [J]. Review of industrial organization, 2019, 54(11):741-774.
- [14]MAUDOS J, GUEVARA J. The cost of market power in banking: social welfare loss vs. inefficiency cost[J]. Journal of banking & finance, 2007, 31(7):2103-2125.
- [15]WGC A, RDOL B, FC C. Financial contagion in internet lending platforms: who pays the price? [J]. Finance research letters, 2021, 65(5):131-142.
- [16]中国互联网金融协会. 中国互联网金融年报[M]. 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 2019:45-51.
- [17]赵晓男,邝雄,郑春梅,等. 京津冀地区互联网金融平台发展研究[M]. 北京:中国金融出版社, 2017:11-23.
- [18]赵建群. 论赫芬达尔指数对市场集中状况的计量偏误[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 2011, 28(12):132-145.
- [19]谢运博,陈宏民. 互联网平台型企业的竞争与最优市场结构——基于双边市场理论视角[J]. 社会科学研究, 2017(2):24-30.
- [20]胡德宝,陈甬军. 垄断势力及其福利损失测度:一个综述[J]. 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4(1):47-57.
- [21]崔婷,刘家麒,魏章进. 网络借贷平台双边用户交叉网络外部性研究:来自中国 P2P 网络借贷行业的经验证据[J]. 数理统计与管理, 2019(3):561-570.
- [22]傅联英,陈兆友,骆品亮. 银行卡市场交叉网络外部性检验及其强度估算——基于二次 B 样条方法修正的归属曲线模型方法[J]. 产业经济评论(山东大学), 2016(3):23-48.

(本文责编:王延芳)

(上接 21 页)

- [21]LOCKWOOD B, REDOANO M. The CSGR globalisation index: an introductory guide [R]. Coventry, CV: CSGR working paper, 2005.
- [22]FIGGE L, MARTENS P. Globalisation continues: the Maastricht globalisation index revisited and updated [J]. Globalizations, 2014, 11(6):875-893.
- [23]SKLAIR L. Competing conceptions of globalization [J]. Journal of world-systems research, 1999, 5(2):143-163.
- [24]GYGLI S, HAELG F, POTRAFKE N, et al. The KOF globalisation index-revisited [J]. Th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2020, 14(3):543-574.
- [25]杨光斌,释启鹏. 带有明显意识形态偏见的西方自由民主评价体系——以传播自由主义民主的几个指数为例[J].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2017(5):52-61.
- [26]李晓西,刘一萌,宋涛. 人类绿色发展指数的测算[J]. 中国社会科学, 2014(6):69-95, 207-208.
- [27]CHINN M D, ITO H. A new measure of financial openness [J]. Journal of comparative policy analysis: research and practice, 2008, 10(3):309-322.
- [28]刘立金,姚远. 欧洲四央行负利率政策的效果评价[J]. 中国财政, 2017, 6(731):66-67.
- [29]周茂华. 欧债危机的现状、根源、演变趋势及其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J]. 经济学动态, 2014(3):138-153.
- [30]DALIO R, KRYGER S, ROGERS J, et al. Populism: the phenomenon [R]. Bridgewater, MA: Bridgewater, 2017.
- [31]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 Trade Barometers [EB/OL]. (2019/8/15) [2021/6/15]. https://www.wto.org/english/res_e/statis_e/wtoi_e.htm#:~:text=WTOTradeBarometersTheWTOhasdeveloped,three%20months%20ahead%20of%20merchandise%20trade%20volume%20statistics.
- [32]王建秀,邵利敏,任建辉. “一带一路”国家逆全球化遭遇程度抑制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吗? [J]. 中国软科学, 2018(7):117-128.
- [33]张应强,姜远谋. 后疫情时代我国高等教育国际化向何处去[J]. 高等教育研究, 2020, 41(12):1-9.

(本文责编:辛 城)